

10-2000

光緒年間的粵曲唱片：「謀得利」和「愛迪生」唱片公司的灌錄製作

Shicheng RO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9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容世誠 (2000)。光緒年間的粵曲唱片：「謀得利」和「愛迪生」唱片公司的灌錄製作。《嶺南學報》，新第二期，241-260。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99/vol2/iss1/9

This 專論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99-2006)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光緒年間的粵曲唱片

——「謀得利」和「愛迪生」唱片公司的灌錄製作*

容世誠

新加坡國立大學

一、引言

留聲機的發明、唱片工業的興起、戲曲唱片的出現，是中國戲曲流播史上的大事。作為一種新興音樂媒體的戲曲唱片，在西方唱片公司的策劃推動下，於清末開始生產並投入中國市場，漸次進入的城市家庭。二十年代電台廣播萌芽，加快和加闊了中國戲曲流播的速度和廣度。留聲機和戲曲唱片的面世，一方面豐富了中國人的音樂生活，但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戲曲聽眾的聆聽經驗¹¹。此外，唱片是一種載音媒體。這種媒體所具備的「物質條件」，往往制約了灌錄唱曲的內容和演唱風格（較明顯的是唱段的長度與演唱的速度），令致灌錄在唱片上的戲曲演唱可以有別於戲台上的現場表演風格。當「唱片戲曲」的演繹方式一旦被「唱片」本身定型後，卻會反過

* 本文得以完成，必須感謝Miss Janet Fargion (National Sound Archive, The British Library), Mr. Bryan Cornell (Motion Picture, Broadcasting and Recorded Sound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Miss Sara Velez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Mr. Richard Spottswood, 陳詠智先生等所提供的協助。筆者又曾獲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粵劇研究計劃邀請，從1999年1月到4月間訪問該校中國音樂資料館，研究館內所藏珍貴粵曲唱片，於此也向研究計劃負責人陳守仁和余少華兩位教授致以衷心的謝意。

¹¹ 例如從根源於村落社火的戲棚前集體觀劇，轉移到家庭裏的私人戶內收聽；從以宗教祭祀為目的的社群活動，轉變為個人的休閒消費。可參，Yung Sai-shing 容世誠，Chan Kwok-bun 陳國貴，“Pleasure as Consump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Leisure in Singapore,” 不日發表。

來左右舞台上的戲曲表演。所以，要認識戲曲傳播的社會性和物質性(materiality)，要瞭解近代科技(包括清末的「聲光化電」)傳入中國後對傳統戲曲文化的衝擊，都應該關注留聲機和唱片工業的發展歷史^[2]。

本文是一篇探討清末粵曲唱片的資料性報告^[3]。討論的對象是兩間跨國唱片公司——英國的謀得利公司(Gramophone Company)和美國愛迪生的「國家」(National Phonograph Company)(以下稱「愛迪生」[Edison])——在光緒(1875-1908)末年出版的兩份粵曲唱片目錄。在這兩種文獻的基礎上，配合相關的唱片歷史史料，例如檔案材料、回憶錄，和宣傳刊物，觀察這兩間西方唱片公司在二十世紀初的粵曲灌錄活動^[4]。限於篇幅，這篇短文祇初步探討以下幾個問題：英美唱片公司在光緒年間是怎樣灌錄粵曲唱片的？在那裏灌錄？灌錄了甚麼曲種？銷售到甚麼地區？至於詳細分析粵曲唱片在粵劇史和香港文化史上的義意，則留待下一篇文章繼續探討。

二、留聲機的出現與西方唱片工業的興起

1877年美國科學家愛迪生(Thomas Edison, 1847-1931)發明「唱筒式留聲機」(phonograph)，開創了錄音科技新紀元，也改變了人類的音樂娛樂習慣。十年後，德裔美籍科學家勃林納(Emile Berliner, 1851-1929)在美國費城佛蘭克林學社(Franklin Institute)向公眾示範他的新發明品「唱盤式留聲機」(gramophone)。從此，「唱盤」(disc)漸次取代「唱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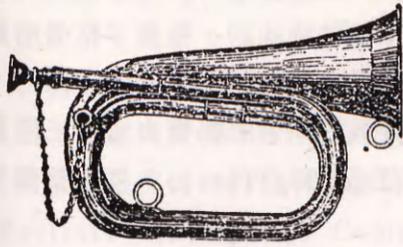
^[2] 研究晚清時期「聲光化電」傳入中國後如何影響近代戲曲劇場的意念，是哈佛大學李歐梵教授向筆者提出的。於此致謝！

^[3] 這篇文章是筆者的第五篇有關粵曲唱片的論文。前此發表過的有：(1)〈二三十年代香港戲曲唱片業與粵樂文化〉，「粵劇音樂國際研討會」宣讀論文，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1997年1月20-24日；(2)〈三十年代香港唱片業與粵語通俗文學：以新月唱片公司為例〉，「香港文學研討會」宣讀論文，嶺南學院(香港)中文系，1998年4月2-4日；(3)“Music and Technology: Recording Cantonese and Peking Oper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Dynastic Decline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November 6-7, 1998, New York, U.S.A; (4)〈清末民初粵樂唱片與粵劇文化(1903-1913)〉，「粵劇跨學科研討會」宣讀論文，香港八和會館和中文大學音樂系「粵劇研究計劃」，1999年12月18-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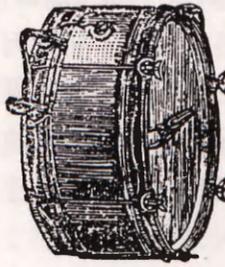
^[4] 除了謀得利和愛迪生外，美國的勝利唱片公司和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在1900年代也曾灌錄粵樂唱片，可惜所存文獻不多。

香港英商謀得利有限公司

請認明本公司各款嚶頭靚貨



黃牌
銀牌
綠牌
唱機嚶
調各陝京



藍牌唱機嚶
調東廣

青蓮牌
蛋白牌
唱機嚶
潮州調
廈門調

飛元青牌
廣東調
京陝調

本公司創設中華三十餘年專辦各國名廠軍營戰鼓號筒樂器學堂需用大小
風琴洋琴以及英國頭等留聲機器各省大小唱碟久已馳名海內荷蒙 仕商
贊譽不既刻又不惜重資聘選京都廣東汕頭廈門第一等名班唱就成套新片
聲音較前十倍响亮質地更為堅固非特永久不變且曲調高雅無雙加以計價
從廉以企招徠 仕商光顧務祈認明本公司各上列嚶頭為記不致魚目之混如
蒙賜賞移 玉本辦務試聽方信言之不謬也此佈

定價從廉

零售劃一

本公司設在香港大鐘樓下屈臣氏對門
分局設在粵省十七甫

經理人劉守明謹啟

圖片一：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謀得利公司的唱片廣告。當時謀得利的總公司設在香港，分店在廣州。謀得利當年出產多種地方劇種的唱片，用不同的片心(label)顏色來區分。「廣東調」的是「藍牌」，也就是Blue Label。資料來源：《粵東小說林》，第7期（丙午年[1906]），影印自黃世仲、黃伯耀（編著）：《中外小說林》（香港：廈門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頁168-169。

(cylinder)成為儲載音響資料的主流物料形式，近代唱片工業也在這個時期開始萌芽¹⁵¹。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美國和歐洲各國都冒起多所著名的留聲機唱片公司。歐洲方面，法國的百代公司(Pathe Freres)於1897年成立；翌年，英國謀得利公司和德國的德意志公司(Deutsche Grammophon Company)同一時期在1898年開業。這三間歐洲留聲機公司的出現，意味着唱片工業邁進一個新時代。至於美國，初期因為專利權的法律糾紛，拖慢了整個唱片工業的發展。1902年之後卻有飛躍的進展。其中以「勝利」(Victor)、「哥倫比亞」(Columbia)，和「愛迪生」留聲機公司最具影響力。這三間實力雄厚的美國唱片公司，被稱為「三巨頭」(The Big Three)，控制整個美國的唱片工業¹⁶¹。

勝利、哥倫比亞，和愛迪生的「三巨頭」不約而同都在清代末葉開始灌錄粵曲唱片。這很可能跟北美有大量廣東移民有關。1903年已經出產粵樂唱片的「愛迪生公司」，創立於1896年，創立人是發明留聲機發的愛迪生，總部設在新澤西州的橙市，而在紐約、芝加哥、三藩市、倫敦、巴黎、柏林、雪梨均設有分公司¹⁷¹。愛迪生發明留聲機後，原本準備將這種新發明品發展成為辦公室裏的錄音機器，協助文書處理工作。後來卻改變市場定位，將留聲機轉化為一種家庭娛樂設備。為了和哥倫比亞公司競爭，爭取一般的家庭市場，愛迪生公司着意於將留聲機普及化和大眾化。它們推出「家庭式留聲機」，並將售價由四十美元下調至三十美元¹⁸¹。目標是要達到「每家都能擁有一部留聲機」。

從1908年的一份「外國唱片目錄」記錄，可以看到愛迪生公司製作了波希米亞、古巴、丹麥、法國、德國、希伯萊、意大利、墨西哥等不同地區

¹⁵¹ 以下有關留聲機與唱片業歷史的討論，主要參考Roland Gelatt, *The Fabulous Phonograph: From Edison to Stereo*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65); Andre Millard, *America on Record: A History of Recorded Sou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eter Martland, *Since Records Began: EMI: The First 100 Years* (London: EMI, 1997).

¹⁶¹ Andre Millard, *America on Record*, pp.49-57.

¹⁷¹ 見*Edison Phonograph Monthly*, 1:1(March 1903), p.1; *Edison Records: A Catalogue of Foreign Selections* (Orange: National Phonography Co., 1908). 現藏於美國紐約公立圖書館(New York Public Library).

¹⁸¹ Allen Koenigsberg, *Edison Cylinder Records(1889-1912): With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Phonography* (New York: APM Press, 1987), p.xx.

的音樂唱片，其中還包括中國的粵曲唱片¹⁹¹。愛迪生公司是以生產蠟筒唱片為主的。早期的蠟筒每個錄音長兩分鐘，改良後延長至三分鐘；1908年的新出品「安播柔型唱筒」(Amberol cylinder)再延長至長四分鐘¹¹⁰。但蠟筒面容易霉爛，不易長久保存，而且體積佔據空間較大，不像唱盤型唱片方便存放，以致在唱片市場上失去競爭能力，漸漸被唱盤型唱片淘汰。1913年，愛迪生公司停止生產唱筒，首次推出唱盤型唱片，唱筒也在唱片市場上淡出。

另一間在光緒年間灌錄粵曲唱片的是英國謀得利唱片公司。謀得利是由美國人威廉奧文(William Owen, 1860-1914)於1898年正式創立。1897年的夏天，上文提到的發明唱盤留聲機的勃林納(後來創辦「勃林納唱片公司」[Berliner Gramophone Company])支持奧文前往歐洲開展歐洲大陸的留聲機唱片事業，開業地點設在倫敦市內的美頓坊(Maiden Lane)，初期是以售賣勃林納唱片公司的美國音樂唱片為主。1898年7月，勃林納作了一個重要的決定，他派遣錄音師佛烈蓋斯堡(Fred Gaisberg, 1873-1951)前往英國，協助奧文設立謀得利公司自己的錄音室，地點位於倫敦美頓坊謀得利辦事處的地庫。就在這個簡陋的錄音室，勃林納開始灌錄以歐洲市場為主導的音樂唱片¹¹¹。勃林納這個策略性的決定，不但改變了蓋斯堡一生的事業，使他成為唱片錄音史上的傳奇人物，也間接影響到中國戲曲唱片，特別是京曲與粵曲唱片的灌錄歷史。

1907年，謀得利公司和美國勝利公司達成協議，將全球唱片市場分割為二：勝利公司主要佔據美國、中國、日本，和菲律賓的唱片市場，其他地區則由謀得利控制¹¹²。同年，謀得利在印度加爾各答設立它們在亞洲區的第一所唱片印造廠，負責印製中國、日本、印度、東南亞，以至尼泊爾、西藏地區的音樂唱片。謀得利也成為二十世紀初英資在亞洲地區的一間主要唱片公司。當時英國國勢正盛，號稱「日不落之國」，殖民地遍佈全球。依靠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網絡，謀得利的唱片市場得到迅速的拓展。

¹⁹¹ *Edison Records: A Catalogue of Foreign Selections.*

¹¹⁰ Richard Spottswood, "The Companies and their Ethnic Records," in *Ethnic Music on Records: A Discography of Ethnic Recordings Produ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3-1942* (Urbana &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0), p. xxxii.

¹¹¹ Peter Martland, *Since Records Began: EMI*, pp. 36-41.

¹¹² John Perkins, Alan Kelly, and John Ward, "On Gramophone Company Matrix Numbers 1898 to 1921," *The Record Collector*, 23:3-4 (1976), p. 57; Peter Martland, *Since Records Began: EMI*, p. 49.

三、謀得利公司在香港的灌錄活動

為了「多方面開拓新市場，設立各地經銷處，並取得當地唱片的曲目目錄」，謀得利唱片公司在1902年派遣蓋斯堡到亞洲地區進行「采風錄音」^[13]。這一年的9月，蓋斯堡率領謀得利的工作人員，攜帶簡便錄音器材，從英國乘輪船往印度，然後開始他的東方「采風之旅」。這次旅程長達兩年，錄音隊伍的足跡，遍及中亞、南亞、東南亞，以及東亞各國。曾經駐足的城市，包括加爾各答、新加坡、香港、上海、東京、曼谷，和仰光等。一直到了翌年(1903)8月，才取道新加坡、加爾各答、德里、孟買，和馬賽，再折返倫敦^[14]。謀得利這次灌曲活動，可以說收穫甚豐。蓋斯堡沿途灌錄了印度、緬甸、泰國、馬來亞、爪哇，中國，及日本等地的音樂唱片共一千七百張。灌錄後的「母片」(master recordings)全數運返歐洲，印製成為唱片後，連同公司出產的留聲機一同運回當地的經銷處，再售回給灌錄唱片所在地的消費者^[15]。

1903年3月，蓋斯堡從日本神戶乘船抵達上海^[16]，在「介中人」(買辦)的協助下，於市內一間酒店的房間內設立臨時錄音室。他們一行人等在上海停留了約十天，以酬金每張四元的價錢，聘請當地伶人灌錄京曲等北方戲曲(包括少量昆曲)。替他們灌片錄音的，包括孫菊仙(孫濂，1841-1931)、汪筱儂(亦作汪笑儂，本名德克津，1858-1918)、汪桂芬(汪謙，1860-1906)等名伶^[17]。蓋斯堡的日記有謀得利公司第一次在中國灌錄音樂唱片情況的紀錄：

[13] 以下討論蓋斯堡的亞洲灌片旅程，主要是根據蓋斯堡的回憶錄《唱片上的樂音》一書。見Fred Gaisberg, *Music on Record* (London: Robert Hale Ltd, 1943), p.52(同書美國版: *The Music Goes Roun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2]), 亦參考了Jerrold Moore, *A Voice in Time: The Gramophone of Fred Gaisberg(1873-1951)*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76)。Moore此書在*Music on Record*的基礎上，加上蓋斯堡的私人日記來敘述蓋氏的生平事跡和唱片事業。

[14] Fred Gaisberg, *Music on Record*, p.52.

[15] Pekka Gronow, "The Record Industry Comes to the Orient," *Ethnomusicology* 25:2(1981), p.251.

[16] 蓋斯堡在抵達上海前，曾替日本川上劇團灌錄唱片。這一段歷史，參Scott Miller, "Dispossessed Melodies: Recordings of the Kawakami Theater Troupe," *Monumenta Nipponica*, 53:2(1998), pp.225-235.

[17] 根據下面將討論到的1903年《謀得利中國唱片目錄》(*Catalogue of Chinese Gramophone Records*)，頁10-22。

3月18日，星期三：我們灌錄第一批唱片。連同樂隊成員約十五個中國佬來了。其中一個中國佬灌唱時，出盡全身氣力的嘶叫，所以整個晚上祇能灌錄兩曲。兩曲過後，他的喉嚨早已沙啞。對他們來說，音樂就是拼命的敲鑼打鼓。他們用上了鼓、三對大鑼、一對拍板、一種類似「班卓琴」(banjo)的樂器，還有音色接近「風笛」(bagpipe)的一種吹管樂器，加上唱者的叫喊聲。這些所謂「音樂」全都灌錄在留聲機上面。¹¹⁸¹

看來蓋斯堡對京曲的演唱風格不太恭維。上文所謂的banjo，應指伴奏京曲的「三弦」，而「音色接近風笛的吹管樂器」，很可能是指「嗩吶」。在第一個工作日，蓋斯堡祇灌錄了十張唱片。但大約十天過後，他們已灌錄得唱片325張¹¹⁹¹。

1903年(光緒29年)4月，這隊來自英國唱片公司的錄音隊伍，抵達英國的遠東殖民地：香港。和在上海的做法相似，他們在香港的一間酒店內設立起臨時錄音室，開始灌錄唱片。蓋斯堡的日記所記這四天的灌錄過程如下：

4月23日，星期四：我們灌錄了35張唱片。這次的灌曲者較上海的低級，也比較骯髒。唱曲方面，上海的也有趣得多。

24日，星期五：灌片45張。

25日，星期六：灌片45張。

27日，星期日：正午十二時，灌片20張。下午三時，收拾行裝，封箱妥當，隨時拔隊啟程。¹²⁰¹

蓋斯堡在這四天內共替謀得利灌錄了145張唱片。蓋斯堡的日記和回憶錄沒有再進一步談到這次灌錄唱曲的音樂風格及其他細節¹²¹¹。到底蓋斯堡在香港所灌錄的是甚麼曲種？是不是粵曲？如果是粵曲，又是甚麼曲目？這幾個問題，或可在一份保存在英國的謀得利公司1903年唱片目錄找到答案。

這份目錄正本藏於英國EMI 唱片公司檔案館。筆者參閱的是倫敦大英

¹¹⁸¹ Gaisberg, *Music on Record*, p.63。 -

¹¹⁹¹ Gaisberg, *Music on Record*, p.63。

¹²⁰¹ Jerrold Moore, *A Voice in Time*, pp.83-84.

¹²¹¹ 筆者並沒有完全看完蓋斯堡的日記，依據的主要為Jerrold Moore轉引的部分。蓋斯堡日記的原文在80年代初，曾經斷斷續續在*The Talking Machine Review*雜誌上連載。

圖書館內國家音響檔案館(National Sound Archive)的複製微卷^[22]。目錄本身並無注明年份，封面祇有《謀得利中國唱片目錄》(Catalogue of Chinese Gramophone Records)字樣，但公司檔案目錄標明年份是1903年^[23]，右上角有代表謀得利公司的「主人的聲音」(His Master's Voice)標志，標誌下面有「天使」(Angel)唱片商標。該目錄封面底下列出經銷謀得利唱片和留聲機的各大城市，包括倫敦、巴黎、柏林、米蘭、聖彼德堡、莫斯科、布魯塞爾、巴薩隆拿，和哥本哈根等歐陸都會。亞洲的據點設在加爾各答。此外，澳洲的雪梨也有經銷處。這規模反映了二十世紀初期謀得利公司的商業網絡範圍。

這份目錄所列謀得利錄製的中國唱片分為兩大類。從第三到第九頁是廣東唱片(Cantonese Records)部分，由第10至22頁則是京曲曲目(也包括昆曲)(Mandarin Records)。粵曲和京曲兩類同時灌錄七寸和十寸的唱片型號。屬於廣東類的共142個曲目，京曲則有310支。目錄所列出的每個唱曲項目，均由六行文字組成。從上到下，第一行作「特請第一等名角」；第二行：灌曲者名字；第三行：所屬行當，第四行：灌錄曲目；第五行「廣東唱曲」部分標明「廣東」，京曲部分則作「上海」，應是指灌錄地點；第六行：唱片編號。

根據前文提到的蓋斯堡回憶錄和日記，謀得利公司在上海灌曲325種，在香港則灌有145個曲目(唱片目錄上的數目，分別是310和142)。所以，無論就灌錄曲目的數目、灌錄的地點和製作年份來看，這份保存在「大英圖書館」的曲目，應是上述蓋斯堡1903年在香港和上海灌錄所得的曲目，即謀得利在光緒年間所製作中國戲曲唱片的面貌。

按照目錄本身的分類，「廣東唱曲」部分分為(1)男喉(male voices)，(2)女喉(female voices)，(3)合唱(duets, trios)，(4)器樂唱片(instrumental records)四類^[24]。四者的灌曲數目如下：

^[22] BIRS/EMI Microfilm, Reel 770。館內目錄索引作771，可能有誤。這份目錄在EMI檔案出現兩次。另一次在1905年部分，見Reel 450A。

^[23] 該日期跟唱片公司「蠟盤編號」(matrix number)的年份記錄符合，參John Perkins, Alan Kelly, and John Ward, "On Gramophone Company Matrix Numbers 1898 to 1921," p.72.

^[24] 這裏的「器樂」是根據原文"instrumental"翻譯。在這一項之下共有兩曲，分別是由金山明(女丑)和蛇仔秋(男丑)灌錄的「急口玲」(急口令?)和「數白杭」(數白攬?)(頁9)。從曲名看來兩首都不屬器樂演奏類，而是說白藝術。

Catalogue of Chinese Gramophone Records.



"Monarch Senior" Gramophone.

CONTENTS.

	PAGE.
CANTONESE Records, 7-inch Size	3 to 5
CANTONESE Records, 10-inch Size	6 to 9
MANDARIN Records, 7-inch Size	10 to 15
MANDARIN Records, 10-inch Size	16 to 22

These Records are for use only on the Gramophone, and are
manufactured solely by

THE GRAMOPHONE COMPANY, LTD.,

LONDON, PARIS, BERLIN, BUDA PESTH, MILAN, ST. PETERSBURG, MOSCOW, BRUSSELS, BARCELONA,
STOCKHOLM, COPENHAGEN, CALCUTTA, SYDNEY.

圖片二：謀得利公司1903年「中國唱片目錄」封面。

資料來源：倫敦大英圖書館國家音響檔案館，原件藏英國EMI唱片公司檔案館。

灌曲種類	灌曲數目		合計
	七吋	十吋	
男喉	51	32	83
女喉	30	21	51
合唱	4	2	6
器樂	無	2	2
合計	85	57	142

目錄中的所謂男喉，實包括小生、武生、公腳、小武、總生、正生、男丑、二花面的八個行當。女喉則主要有花旦和正旦。另有女丑唱曲一首，卻歸入「器樂唱片」部分。各個行當的灌錄唱曲數目，可歸納成為下表：

行當分類	灌曲者	灌曲數目
武生	5	10
小武	5	6
花旦	22	53
正旦	1	1
正生	1	1
總生	5	7
小生	15	36
公腳	5	21
二花面	1	2
男丑	3	4
女丑	1	1

從這個簡表，可以看到光緒年間的粵劇行當和今天以「六柱制」為主的粵劇行當藝術有很大的分別^[25]。光就灌曲的數目來說，「男喉」類的唱腔，以小生行當最受歡迎，十五名伶人共灌曲三十六種。其次是公腳，再下來是武生、總生，和小武。「女喉」方面，最多的是「花旦」唱腔，灌錄了五十三支唱曲，屬正旦的祇有一首。

^[25] 筆者在另一篇文章會更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又「六柱制」即以文武生、小生、正印花旦、二幫花旦、丑生、武生為臺柱，支持整個戲的演出。參黃鏡明、賴伯疆，《粵劇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年），頁263-266。也可參黎鈺編，《香港粵劇口述史》（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頁171-187。

按照唱片目錄所載資料，替謀得利灌片的主要是當時的粵劇伶人。屬武生行當的有：公爺創、架子榮、新靚耀、大口東、靚耀。小生有細倫、亞廣、亞福、亞沾、亞鎮等。灌片最多的公腳是新保，共灌曲九支，其餘的有亞孝、顛禮、新旦。小武有肥仔懷、潤蘇、大和、崩牙昭、肥仔王。正生是亞耀、二花面是大牛蘇、總生有亞茂、亞柏、椰子安等，男丑則有蛇公禮、蛇仔秋，和鬼馬如。唱「女喉」的主要是男花旦，有鮮花旺、廣仔、細明、鮮花銀、才仔、白蛇滿、蘭花米、揚州清等。

在唱片目錄上，出現了「華仔」和「燕仔」兩個名字。在這兩名灌曲者的行當欄中稱她們為「女旦」、「女人」，甚至「美女」，很明顯「女人」、「美女」，甚至「女旦」都不是行當的類別¹²⁶¹。看來燕仔和華仔身份有別於一般的粵劇男花旦，是兩名「女性灌曲者」。蓋斯堡的回憶錄曾經提到，在香港四天裏來到錄音室灌曲的灌曲者，不少是「茶樓女伶」(tea-house girls)。蓋斯堡形容她們的外觀：都留了長長的指甲，顏色鮮艷；她們的穿戴裝扮，活像價值不菲的洋娃娃；因為纏足的關係，都是由健碩的隨從背到錄音室¹²⁷¹。這裏蓋斯堡描述的 tea-house girls，應該是指「妓院歌姬」。目錄中的燕仔和華仔，應該屬於這個類別。其實青樓妓院一直是中國音樂與曲藝的重要表演場合¹²⁸¹。經常被學者引用的小說筆記，如沈復(1779-1850)的《浮生六記》、張心泰的《粵游小識》，和徐珂(1869-1928)的《清稗類鈔》等，都提到廣州沙面和後來的穀埠花艇唱曲的盛況。根據香港政府在1879年出版的《1867年傳染病條例報告書》，在十九世紀中後期香港較為高級的妓寨都有特別音樂師傅向妓女教授音樂曲藝。她們經常被「飛箋」應召到酒樓和私人俱樂部伴酒演唱；其中不少曲藝非凡，更會作公開演出¹²⁹¹。由此可

¹²⁶¹ 可以看到抄寫這份目錄的人對這兩位唱者的「行當類別」感到困惑，不知應該如何標籤這兩位灌曲者的行當，所以才稱她們為「女旦」、「女人」，以別於其他灌片的男性「花旦」。更加隨便的、半帶開玩笑的稱之為「美女」。抄寫的人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份目錄經過整整一個世紀以後，會成為粵曲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獻。

¹²⁷¹ Gaisberg, *Music on Record*, p.64.

¹²⁸¹ 參陶慕寧，《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近期討論民初粵妓的，參Virgil Kit-yiu Ho 何傑堯，“Selling Smiles in Canton: Prostitu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East Asian History*, 5(June 1993), pp.101-132.

¹²⁹¹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by His Excellency John Pope Hennessy, C.M.G. to Enquire into the Working of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Ordinance, 186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1879), Appendix, pp.1-2, 30. 筆者感謝香港大學冼玉儀(Elizabeth Sinn)教授提供以上材料。

見，省港兩地的花國歌姬是當時曲藝演唱界的專業唱家，謀得利聘請她們灌錄唱片，是順理成章的。蓋斯堡在其回憶錄中卻聲稱在香港灌片者以這類「妓院歌姬」佔大多數，這就和唱片目錄所反映的有相當的出入。根據這份目錄，灌曲者是以伶人為主，唱「女喉」的大部分是男花旦，而華仔和燕仔合共灌片不超過十曲。這裏很可能是蓋斯堡記憶有誤。

這份謀得利目錄祇列出灌錄曲目並沒有清楚說明所屬曲種。但從曲日本身來看，一百四十多支唱曲多是粵劇選段，也就是以「梆子」和「二黃」為基本唱腔的「班本」。但目錄中也可以找到【鮮花調】、【送情郎】和【花亭鬧酒】一類的「小調」曲目，看來他們在香港也灌錄這類非梆黃的「小調」唱曲。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次謀得利錄得的曲目中，包括不少古腔粵劇的傳統名曲。其中屬「大排場十八本」的有《辦才釋妖》、《下南唐》、《打洞結拜》、《打雁尋父》¹³⁰¹；屬傳統「八大曲」的有《東坡訪友》、《辦才釋妖》、《魯智深出家》、《附薦何文秀》、《百里奚》，和《數八仙》¹³¹¹。其他名曲計有《沙灘會》、《重會李夫人》、《閩留學廣》、《梁武帝出家》、《廢鐵生光》、《寡婦訴冤》、《斬四門》等等。某些曲在下文將討論的美國愛迪生唱片公司也有灌錄。總而言之，這份曲目清單可以說代表了光緒宣統年間的粵曲流行曲目，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

這份目錄所記屬實的話，我們可以想像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上述粵劇伶人或歌姬女伶都曾經通過「買辦」的介紹，在香港替英國謀得利公司灌錄唱片。他們不一定全數定居香港。但在4月23到27日的四天裏，以上六十多位灌曲者先後來到香港市內的一間酒店房間，房間內早已安排好一隊伴奏樂隊，以及一套錄音儀器。他們面對一具他們從未見過的收音器，在一名洋人(蓋斯堡)的引導下，灌錄他們的首本「班本」名曲。在省港兩地，從前

¹³⁰¹關於粵劇傳統劇目的討論，見陳非儂，《粵劇六十年》(香港，自印本，約1983年)，頁34-41；黃鏡明、賴伯疆，《粵劇史》，頁141-147。

¹³¹¹「八大曲」的討論見潘賢達，〈粵曲論〉，《戲劇藝術》，1期(1954)，頁45-49。這篇文章指出「八大曲」其實包括十一支曲，大約「盛行於五十年前」(亦即1900年代)。所謂「八大曲」是：(1)曹福遇雪登仙(簡稱〈走雪〉)，(2)唐三藏取西經(簡稱〈取經〉)，(3)東坡訪友或辦才釋妖(簡稱〈釋妖〉)，(4)韓信棄楚歸漢(簡稱〈投漢〉)，(5)李忠賣武及魯智深出家(簡稱〈賣武〉)，(6)百里奚會妻(簡稱〈會妻〉)，(7)楊六郎罪子(簡稱〈罪子〉)，(8)黛玉葬花，(9)附薦何文秀，(10)雪中賢(即「大力將軍」故事)，(11)大牧羊(即〈蘇武牧羊〉)，見該文頁47。也可參禮記(羅澧銘)，《顧曲談》(香港：星島日報承印部，1958年)，頁38-47。

能夠聽到這些「班本」的場所，主要是現場的「戲棚」、「戲園」，和「妓院」。但當留聲機和粵曲唱片在清末面世後，這種聆聽空間和場合限制也隨之打破。藉着新科技、新媒體，和跨國公司的全球性商業網絡，他們的名曲可以流播到世界的不同角落。

四、愛迪生公司灌錄的粵曲唱片

當蓋斯堡在香港聘請伶人灌錄粵曲時候，美國的愛迪生公司也在同一年製作粵曲唱片。灌錄地點卻不在中國本土，而是在太平洋另一邊的美國西岸三藩市。1903年，宣傳愛迪生唱片的《愛迪生留聲機月刊》(*Edison Phonograph Monthly*)，談到這期唱片的製作：

在二月份的新曲預告，我們宣布會錄製四十六隻中文鍍金唱片。這批唱片，是在三藩市特別為國家留聲機公司印製。為確保製作水平，我們特別派遣工廠唱片部經理米勒華(Walter Miller)，從新澤西州橙市總部前赴加州負責印製工作。他將帶同最適合的灌音儀器，竭盡所能，務求為千萬留聲機愛好者呈獻一系列最佳素質的中文唱片。這期是我們製作中最獨特的外國唱片了。共灌錄唱片四十六張，包含十九個不同曲目。^[32]

前文說過，以當時的錄音技術，每一隻唱盤大約可容納兩分鐘的錄音。所以在上述十九個曲目裏，就有九支唱曲需要灌錄多過一張唱片。例如《寡婦訴冤》需要灌錄三張，《沙灘會》則用上六張，《斬四門》更用十二張。唱片公司特別抓緊這個「買點」，突出宣傳《斬四門》一曲：

曲目單的第一支屬弦索伴奏唱曲(按：即「班本」)，名為《斬四門》。灌錄整首唱曲，共用上十二張唱片。這十二張唱片，是「國家留聲機公司」最引人入勝的唱片製作。^[33]

接下來《月訊》列出愛迪生公司這期灌錄的十九個曲目。介紹完上述唱片曲

^[32] "Chinese Moulded Records," *Edison Phonograph Monthly*, 1:1(March 1903), p.6.

^[33] "Chinese Moulded Records," p.6.

目後，文章繼續說：

本公司印備以上唱片的宣傳資料，內容英中兼備，早在二月已經寄到所有店號。現仍有小量存放於各埠的「代理商號」(Jobbers and Dealers)，歡迎各地華人索閱。請逕向本公司宣傳部查詢地址。^{134]}

從這段文字看來，愛迪生在美國所灌錄的粵曲，主要銷售對象是美國境內各大城市的中國移民。這個問題留待下文討論。現在先要指出，引文所提到現仍保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的一種英中參照的「宣傳資料」。那是一份研究光緒年代美國製作粵曲唱片的重要文獻。

這份目錄合共三頁，封面作「愛迪生外國唱片(鍍金)」(Edison Records: Foreign Selection, [Gold Moulded])，右上方有「1904年4月」字樣^{135]}。封面清楚列明唱片價錢，分兩種：「標準型」(Standard size)每隻美元五毛，十二隻售價五元，「音樂會型」(Concert size)每隻一元，十二隻售價十二元。又特別列明郵購辦法等細節，方便散居美國境內不同地區的華人購買。

正如上文所說，目錄內容是英中兼備，而所收十九個曲目，都附有英文翻譯，如《斬四門》譯作“To Destroy the Four Gates”、《寡婦訴冤》是“Widow’s Lament”、《雪中賢》是“Wise Man in the Snow”。樂曲《賀壽送子》是“To Celebrate Long Life and Present a Son”，「木魚」則意譯為“comic recitation”。此外，如有曲目需要多張唱片灌錄，目錄也會特別標明，例如《斬四門》一欄清楚注明「須有十二隻唱盤，其曲方得完全」，《沙灘大會》則「須有六隻唱盤，其曲方得完全」。值得注意的是，《雪中賢》和《孔明歸天》兩曲卻標出「須有二隻唱筒，其曲方得完全」。這裏用了「唱筒」而不用「唱盤」(英文原文均作record)，也許並無深意，祇是撰文者偶然轉變用詞。但按照一般留聲機唱片史的說法，愛迪生公司一直堅持同時生產「唱筒式留聲機」(phonograph)和「唱筒」(cylinder)，直到「唱筒」在市場上明顯失去競爭能力，才不得不在1913年放棄傳統，開始出產「唱盤型唱片」^{136]}。所以1903年的唱片目錄上分別出現「唱片」

^{134]} “Chinese Moulded Records,” p.6.

^{135]} Edison Records Catalogs: Music 3222, Reel 1 & 2, Motion Picture, Broadcasting and Recorded Sound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36]} Allen Koenigsberg, *Edison Cylinder Records*, p.xi; Roland Gelatt, *Fabulous Phonograph*, p.324; Andre Millard, *America on Record*, p.65.

EDISON GOLD MOULDED RECORDS FOREIGN SELECTIONS

PRICES OF EDISON RECORDS

Standard Size, 50 cents each
\$5.00 per dozen

Dealer's discount allowed on price of single records or 75, not on dozen price.

Concert Size, \$1.00 each
\$12.00 per dozen

Standard Records by mail, packed singly on 7, in improved mailing case, each 17 cents extra
Remit by Bank Draft, Post Office Order, or Express Money Order.

ALWAYS ORDER RECORDS BY NUMBER, NOT BY TITLE

Order by Catalogue Number only.
買購數號內部照獨為所

數號目錄

- 12741 }
12742 } Song and Orchestra.
12743 } 曲及索絃
12744 }
12745 }
12746 }
12747 }
12748 }
12749 }
12750 } "To Destroy the Fair Gates."
12751 } Requires 12 Records to give Song complete.
12752 } 全完得方曲其盤唱只二十有須

斬四門

- 12753 }
12754 } Song and Orchestra.
12755 } 曲及索絃
"A Widow's Lament."
Requires 3 Records to give Song complete.
全完得方曲其盤唱只三有須

婦寡訴冤

- 12756 }
12757 } Song and Orchestra.
12758 } 曲及索絃
"Assembly on a Sand Bank."
Requires 6 Records to give Song complete.
全完得方曲其盤唱只六有須

灘沙大會

- 12763 }
12764 } Comic Recitation by
SHER DOY WONG.
Requires 3 Records to give Recitation complete.
全完得方曲其盤唱只三有須

旺仔蛇木魚

- 12765 }
12766 } Song and Orchestra.
曲及索絃
"The Nest in a Shoe."

窩高鞋

- 12766 }
12767 } Song and Orchestra.
曲及索絃
"To Visit a Friend."

訪友

- 12767 }
12768 } Song and Orchestra.
曲及索絃
"Travelling by the West Lake."

遊西湖

- 12768 }
12769 } Song and Orchestra.
曲及索絃
"Chu Leong Collects Rents."

良趙收租

- 12769 }
12770 } Song and Orchestra.
曲及索絃
"An Old Valet Carries a Letter."

院老帶書

- 12770 }
12771 } Song and Orchestra.
曲及索絃
"A Wise Man in the Snow."
Requires 2 Records to give Song complete.
全完得方曲其盤唱只二有須

雪中賢

- 12772 }
12773 } Song and Orchestra.
曲及索絃
"The Death of Coong Ming."
Requires 2 Records to give Song complete.
全完得方曲其盤唱只二有須

明孔歸天

- 12774 }
12775 } Comic Recitation by
SHER DOY WONG.

旺仔蛇木魚

圖片三：愛迪生公司1904年(光緒三十年)的「外國唱片目錄」封面，和當年所錄製的部份廣東曲目。
資料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和「唱筒」兩詞，它們到底是否同義，抑或有其他分別，仍值得深究。

這次愛迪生公司灌錄的粵樂曲種，共有三類。套用唱片目錄的名詞，是：「弦索及曲」(Song and Orchestra)，「木魚」，和樂隊演奏(Band)。若用今天的粵樂名詞來說，也就是：「粵曲」(即上文所說的「班本」)，「廣東說唱」，和「粵劇排場音樂」。現將灌錄的十九個曲目羅列於下：

「弦索及曲」：斬四門、寡婦訴冤、沙灘大會、窩鞋、訪友、遊西湖、趙良收租、老院帶書、雪中賢、孔明歸天

「木魚」：無曲名(祇注明灌曲者名字：蛇仔旺)，鳳凰歌、黃道收妖

「排場音樂」：賀壽送子、小開門、朦朧、擺宴、諫君

《沙灘大會》、《訪友》、《寡婦訴冤》，和《斬四門》四曲，又見於謀得利1903年的目錄。《雪中賢》和《訪友》屬於所謂「八大曲」。這些都是粵曲的經典曲目。至於《賀壽送子》、《小開門》、《諫君》和《朦朧》等，都是著名的粵劇音樂，今日的粵劇仍有使用。

除了「班本」外，愛迪生公司也灌錄了「木魚」。「木魚」和「龍舟」、「南音」、「板眼」等，都是廣東說唱曲類^[37]。灌錄兩曲「木魚」的蛇仔旺，除了受聘於愛迪生公司，也替另一間勝利唱片公司灌片，看來是當時擅唱諧曲的著名丑角。在這份目錄裏，他的名字(也是唯一列出的灌唱者名字)音譯作 Sher Doy Wong。Sher Doy 看來並不是「蛇仔」的粵語(廣府話)對音，而屬於廣東四邑的台山話。此外，以上的十九首唱曲的曲目，又見於1908年愛迪生公司出版的另一份唱片目錄的「中國類」部分^[38]。它們的中文拼音，也是根據台山話的。例如《斬四門》是Jom se moan，《沙灘大會》是Sa hon ti wy，《寡婦訴冤》是Ga fu cha man，「木魚」是Muck mui。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集中在美國西岸「大埠」三藩市的中國移民多數是台山人，這一份唱片目錄即反映出台山話在美國華人社區的主導地位。台山

^[37] 參譚正璧、譚尋，《木魚歌、潮州歌敘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陳鐵兒，〈粵劇歌樂近百年來的遷變〉，收入黃兆漢、曾影靖編訂，《細說粵劇：陳鐵兒粵劇論文書信集》(香港：光明圖書公司，1992年)，頁11-24；Yung Sai-shing, "Mu-yu shu and Cantonese Popular Singing Arts,"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2:1(Fall, 1987), pp.16-30. 近年的日文研究見金文京等編，《木魚書目錄》(東京：好文株式會社，1995年)。

^[38] *Edison Records: A Catalogue of Foreign Selections.*

話(並非粵語,更不會是官話)也自然成為三藩市華人社區的日用語言。愛迪生公司灌錄中國唱片,銷售對象似為在美國的中國移民,其實也是以台山人為主。負責撰寫目錄的也可能是台山人,所以目錄用上台山話是不難理解的。有趣的是,當時的粵曲,例如《寡婦訴冤》、《斬四門》、《雪中賢》,和《訪友》等,今天稱為「古腔粵曲」。在當時都不是用「粵語」(更不是台山話)而是以「舞台官話」唱出(粵曲要等到1920年代才開始改唱粵語)。這也等於說,在三藩市所製作的「粵曲唱片」,唱片目錄是用台山話,唱曲內容則用「舞台官話」,都和粵語沒有直接關係。再者,從這份1908年的唱片目錄去看,這些用「舞台官話」演唱的粵曲,是愛迪生公司所生產的唯一一種「中國戲曲」(謀得利則分別有粵曲和京曲)。唱片目錄中的「中國戲曲」,其實就祇有「粵曲」。換言之,那時在美國華人社區可以聽到的中國戲曲唱片,主要也是粵曲唱片。

至於粵曲唱片在美國的銷售範圍,當然不會祇限於三藩市。北美東岸的重要城市,例如紐約等廣東移民聚居地也是二十世紀初粵曲唱片的主要市場。麻薩斯州武斯特市(Worcester)就有上述的十九款粵曲唱片出售。埃惹特威爾遜(Everett Wilson)是一名愛迪生公司在武斯特市的營業代表。他在1903年7月號的《愛迪生留聲機月訊》,轉載一則武斯特市《電訊報》(Telegram)有關上文十九首灌錄粵曲的報導。文前附有由威爾遜寄給《月訊》編輯部的一封信,反映出愛迪生公司當時推銷中國唱片的方法:

茲寄上本地報章的一段剪報,報導本人售與一名中國佬的唱片配套。我從「代理商號」處取得中文唱片曲目的黃色條子,派放在我上班下班時經過的幾間洗衣店。就是這樣成功地售出價值四十元的愛迪生公司產品,包括一台「標準型留聲機」、大約三十隻唱片、一隻大號「響角」(horn)、還有其他零星貨品。¹³⁹¹

往下的《電訊報》引文有大小標題各一。大標題是:「雜碎音樂」(Music A la Chop Suey);下有小標題一行:「Charlie Goey定購二十四種愛迪生中文唱片」。現節錄數段剪報如下:

Charlie Goey 是一名追上潮流的中國佬。他就擁有這張(蛇仔旺的

¹³⁹¹ "A Reporter Hears Our Chinese Records," *Edison Phonograph Monthly*, 1:5(July, 1903), p.12.

木魚歌)以及其他的,二十五隻中文唱片。對武斯特市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事情。就算是整個新英倫(New England)境內,也祇有在波士頓(Boston)和普洛維頓斯(Providence)兩處,才可能找到這類中文唱片。

Charlie Goey 也算得上是個摩登人物:他愛穿「花旗」服裝^[40],在「南橋路」616號開了一間生意興隆的洗衣店。他獲悉原來美妙的留聲機可以像北京大人一般的講「官話」,於是在「花街」七號,埃惹特威爾遜那裏購入一台留聲機,以及26張在三藩市灌製的愛迪生唱片。

《電訊報》記者昨天有幸能聽到這批唱片音樂,自此他就祇鍾情於「雜碎」,其他食物不屑一顧。現在以嶄新世紀的留聲機產品,灌錄最古老的語言,其中與別不同的是:須要用上兩隻到十二隻不等的唱片,才能完整錄完一支唱曲。^[41]

接下這名記者(不會是一名華人)逐一介紹這批粵樂粵曲。在這數段文字裏,少不了對中國音樂的挖苦,對中國移民的嘲笑。處於整整一個世紀以前的1900年代,這些種族和文化偏見是很難避免的。但文中特別推崇兩支唱曲:《寡婦訴冤》和《斬四門》。他說:

裏面有一首佳作,名為《寡婦訴冤》。由始至終唱曲均時值準確、旋律優美。以它活潑明快的風格,改稱「歡樂寡婦」也不為過。另一首美妙的《斬四門》,用上十二隻唱片灌錄。我們《電訊報》的記者祇聽了其中的一隻,已經過足癮,興奮到至少「斬」去「五門」。^[42]

五、結語

在未有更早的粵曲唱片史料出現之前,上述謀得利和愛迪生公司唱片目錄可算是現存最早的廣東唱片歷史文獻,展示出廣東曲藝在光緒末年的面

^[40]原文是“Melican clothes,”有嘲笑中國人的蹩腳英語發音的含意。「花旗」是廣東人對美國的俗稱。

^[41]“A Reporter Hears Our Chinese Records,” p.12.

^[42]“A Reporter Hears Our Chinese Records,” p.13.

貌。這篇文章嘗試初步整理這兩份長期埋藏在英美圖書館內的史料，從而勾畫粵曲史和廣東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片段。

錄音技術和唱片工業的出現，與中國戲曲的傳播有莫大關係。當西方唱片工業仍處於萌芽階段，謀得利和愛迪生兩間公司(其實也包括「哥倫比亞」和「勝利」)已經開始生產粵曲唱片。這個時期兩間唱片公司的灌錄活動，反映出早期跨國唱片公司開拓中國唱片市場的情況。仗賴英帝國的殖民地網絡，謀得利公司派遣錄音隊伍遠征東亞，在香港聘用超過六十多位伶人唱家，灌錄了一百四十多種曲目。愛迪生公司的製作地點，是美國廣東移民聚居的三藩市。雖然灌錄的曲目遠遠比不上謀得利，但也特別派出錄音師從新澤西州到西岸主理是次錄音作業。兩間公司在同一年都灌錄粵曲唱片，它們所覬覦的市場地區則可能略有不同。

蓋斯堡曾經指出，清末的中國唱片留聲機市場集中在幾個「通商口岸」(Treaty Port)(應該指天津、上海、廈門、廣州、香港等沿岸城市)。它們的蓬勃興旺程度和日本的不相上下。至於中國境外，如美國、馬來亞，和澳洲等地的中國華僑，因消費能力較高，對唱片也有較大的需求^[43]。正如前文所說，愛迪生公司的粵曲唱片製作，主要銷售對象是美國國內的廣東移民。作為英國遠東殖民地的香港，是謀得利(及其他跨國唱片公司)進軍中國華南唱片業的其中一個橋頭堡，必然也是粵曲唱片的主要銷售地區。另一個謀得利公司的銷售市場，是東南亞地區的英屬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早在光緒宣統年間，謀得利的粵曲唱片已經銷售到海峽殖民地的新加坡。大英圖書館保存一份謀得利1909年在新加坡出售粵曲唱片的目錄，清楚說明是由新加坡羅便臣公司(Robinson & Co., Sole Agents, Singapore)代理出售^[44]。其中有幾種曲目錄音仍藏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資料館內。

這些音響和文字材料都是研究二十世紀初廣東曲藝的重要資料，提供不少新的線索，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清末的粵劇粵曲文化。這些都會另文交代。

^[43] Gaisberg, *Music on Record*, p.64.

^[44] BIRS/EMI Microfilm, Reel 662.

承頂聲明
 啟者新嘉坡漆木山二百二十七號許和利號乾菓店出水山內生理原係許來理許和義許捷蘭許人與廖順五人合夥自丙申年六月間開創向來無異今因許和義志願別業願將和利號許和義所得之生理股份全頂與許則欽承受妥請到公親家林家廣昭兩位老翁駕臨秉公核算明白存錄項即日官公親面前交領清楚倘和利號日後生理盈虧與退股人許和義無涉如許和義日前自已有與各號往來賬目揭借等項與他手理明是問與承頂人許則欽即和利號等人無涉特此聲明免滋後論
 大清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
 承頂人許則欽啟

普印聲明
 啟者本號所刻之成茂雷東印係為西札往來之用不準取替倘如有有人將許雷東印打單蓋印與外國取貨借者皆無效手是問與本號無干先此聲明以免後論
 光緒廿九年七月十二日
 王家山脚許成茂椒蜜店謹啟

啟者特字通知 緣本公司所估兌之塗油歷來已能標為記處處馳名矣但刻下叻坡有一庄失船掩木之土油茲欲平沽近聞有人私買龍標油頑預裝掩水與什庄土油假為龍標原油售發此皆敗風之為倘知有人詐裝者本公司查覺即行控究決無寬宥肅此佈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

收 盈 聲 明 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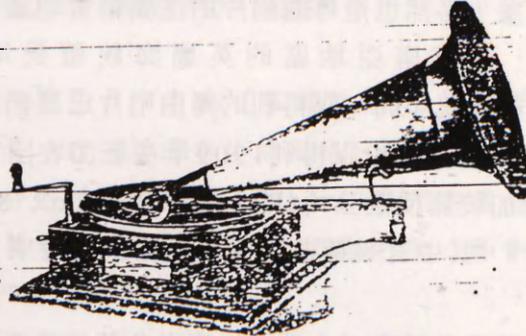
大英欽命新嘉坡輔政司 為招人投票承供物料事照得本國家每年欲用汽油二千三百牙蘭左右以供王家山頂塔燈之用承供此油者每季欲取此油即當送交不得違悞且承供之期係由西一千九百零四年實添末月一號起計為此示仰商民人等一體知悉汝等有欲承供者其票當于西一千九百零三年慈民末月一號即華九月十三日中午以前投交本署以憑選擇至于價之高低均由國家主裁慎毋望切切特示
 大英一千九百零三年九月一號 一三

明 聲 假 冒 土 油 出 沽 貨 平

啟者特字通知緣本公司所估兌之塗油歷來已能標為記處處馳名矣但刻下叻坡有一庄失船掩木之土油茲欲平沽近聞有人私買龍標油頑預裝掩水與什庄土油假為龍標原油售發此皆敗風之為倘知有人詐裝者本公司查覺即行控究決無寬宥肅此佈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

平 貨 沽 出 告 白

啟者本公司定于由西一千九百零三年八月廿八號起將本行中所存之貨一律平價沽出以廣銷場特此佈告
 大英一千九百零三年八月廿八號
 羅敏申公司謹啟



圖片四：1903年新加坡《叻報》刊登羅敏申公司的留聲機廣告。

資料來源：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